

捍卫自由人文主义？

——评戴维·威廉森的《死白男》

杨保林

(苏州大学 外国语学院, 江苏 苏州 215006)

摘要:戴维·威廉森是当代澳大利亚最有影响力的剧作家之一,他的作品紧扣时代主题,语言生动幽默,内容贴近现实生活,受到观众的广泛认可。威廉森往往使用讽刺来实现戏剧的幽默效果和讽刺目的,在《死白男》中威廉森以反讽式语言和语境讽刺了后结构主义理论,捍卫了澳大利亚的“白人神话”,扮演了“文化斗士”的角色。威廉森的保守立场使得该剧备受争议,他也因此成了“文化论战”的反角。

关键词:戴维·威廉森;《死白男》;自由人文主义;后结构主义

中图分类号:I10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5420(2010)01-0088-04

戴维·威廉森(1942 -)是当代澳大利亚最具影响力的剧作家之一,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戏剧创作,迄今已有三十多部剧本问世,其中有些经改编后搬上了银幕。他的作品先后获得包括英国“乔治·迪瓦恩奖”和“澳大利亚作家协会年度最佳剧本奖”等多项大奖,1983年威廉森因为其在戏剧领域的“杰出贡献”而获得澳大利亚 Officer 勋爵奖章,1988年威廉森被冠以“澳大利亚国宝”之称。威廉森在戏剧创作方面取得的杰出成就使他声名鹊起,也推动了澳大利亚戏剧的繁荣发展。威廉森在当代澳大利亚戏剧界具有广泛的票房号召力,凯瑟琳·布里斯班认为他创造了“威廉森经济效应(Williamson economy)”^[1]。

威廉森的剧作一向以幽默和讽刺著称,他早期的剧作如《搬家公司》(*The Removalists*, 1971)等更是融合了黑色喜剧的成分,在拉玛玛剧院一经演出便引起轰动。然而,威廉森的创作思想和关注的焦点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发生了变化,“虽然威廉森早期的剧作产生于新浪潮运动,但他不久便脱离了这种他认为令人沉闷、有碍创造性的集体决策和‘毛主义的权力戏剧’”^[2]。创作于1995年的《死白男》(*Dead White Males*)是威廉森颇感满意的一个剧本,该剧曾在悉尼歌剧院连续上演,而后又在澳大利亚全国巡演,但是,由于威廉森在剧中影射了澳大利亚当时如火如荼的“文化论战”,使得这部戏剧备受争议。“威廉森取得

巨大成功的同时不得不和批评家们进行一场无休止的文化论战,他认为在批评接受和观众认可之间存在着无法解释的意见差异。”^[2]威廉森在《死白男》中特意设置了莎士比亚这一角色,为的就是将其置于当时澳大利亚的“文化论战”之中,以彰显自由人文主义的优越性及其蕴含的“普遍真理”,通过戏剧反讽来质疑诸如女权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等后现代主义理论,并藉此影射当时广受责难的澳大利亚大学教育。

一、“理论”的不堪

“死白男”这一术语是后现代理论的产物,用来批评西方文明体制里过于重视那些已经去世的欧洲白人男性及其“经典作品”,如莎士比亚与他的戏剧。英国著名的文化唯物论批评家特伦斯·霍克斯就将莎士比亚比作一个“黑洞”(black hole),任凭人们随意编织莎剧的意义。威廉森显然不同意这个观点,他认为莎士比亚的剧作是自由人文主义的集中体现。因此威廉森让莎士比亚在《死白男》中复活,并借安吉拉之口描述莎士比亚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这一反讽式处理是对后结构主义理论所持的“死白男”作出的相应抵抗。反讽(Irony)作为一种修辞,最早出现在古希腊时期,本来指古希腊戏剧中的一种角色类型,即佯作无知者^[3]40-43。“新批评”

派扩展了这一概念,如布鲁克斯在其《反讽——一种结构原则》中称反讽为“语境对于一个陈述语的明显歪曲”,现代反讽概念早已超出了修辞范围,而涉及如语境与篇章结构等诸多因素。威廉森在《死白男》中将人物置于一个冲突的戏剧情节当中,通过对话刻画了各个人物的不同性格及思想倾向,以戏剧反讽来实现其“讽刺”后现代理论的目的。

威廉森在该剧一开始就安排了一场生死之战。安吉拉是一位年轻貌美、思维敏捷的大学生,她喜欢莎士比亚的作品,正当她向莎士比亚表达自己的钦佩之情时,一位三十多岁、衣着时尚休闲的男子拔枪打死了莎士比亚,并提醒安吉拉要留意敌人。这位视莎士比亚为敌的男子正是安吉拉的老师,在大学教文学理论课的格朗特·斯温博士,一位典型的后结构主义者。他认为世上没有“绝对真理”,更没有所谓永恒的“人性”,而“现实”是由意识形态构建的,斯温博士甚至认为莎士比亚及其所代表的自由人文主义其实是西方父权意识形态的帮凶和爪牙。安吉拉对这些观点将信将疑,关于“意识形态构建现实”的论断帮她拓展了思路,但同时也引起了她对“真理”及“现实”的疑惑。带着好奇与疑惑,安吉拉开始注意家人的言行。安吉拉的母亲萨拉是一位“激进女权主义者”,在为祖父科尔·扎德庆祝生日而举行的家庭聚会上,大家的话题慢慢转向了澳大利亚的女权主义运动:

马丁:萨拉,女权运动并没有改变一个事实,那就是男人需要女人,而女人同样需要男人。

萨拉:毫无疑问,女权运动带来的一个结果就是男人需要女人,而女人不见得就需要男人。^{[4]10}

作为一位事业型女性,一位“激进女权主义者”,萨拉希望“结婚是安吉拉的最后一项安排”^{[4]11},具有反讽意味的是,萨拉和马丁之间的婚姻并没有因她持有激进女权主义思想而受到任何威胁。萨拉在随后的谈话中透露,其实她很喜欢《驯悍记》里的彼特鲁乔这一角色,她甚至建议安吉拉“找一个有钱人,跟他结婚,生六个孩子!”^{[4]64}安吉拉在和家人的谈话中发现,被家里其他人指责为“沙文主义者”的祖父科尔其实是一位慷慨善良的澳大利亚人,而萨拉前后矛盾的说辞将安吉拉关于女权主义和父权意识的认识完全打乱。女权主义运动不仅是争取女性在社会中的各种权利,而且试图颠覆西方社会长久以来形成的父权意识形态。以“激进女权主义者”形象出现的萨拉,表面上是一位与家庭里的父权意识作斗争的现代女性,实际上却赞同父权思想,这让安吉拉大失所望。

作为“死白男”的莎士比亚竟然在剧中复活并数次出现在安吉拉的面前,而他并不知道自已受人尊崇。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莎士比亚对西方文化如此重要呢?《死白男》里持后结构主义理论的斯温博士认为:学文学并非为了积累智慧,而是为了获取权力,巩固父权意识形态。在斯温博士的引导下,安吉拉逐渐接受了后结构主义的一些观点,认为莎士比亚的剧作如《皆大欢喜》和《驯悍记》带有明显的父权主义因素,她甚至指责莎士比亚是一位“性别歧视者”。面对莎士比亚的自我辩白,安吉拉不为所动,并决心调查她自己家存在的“父权意识形态”,但是祖父科尔所表现出来的慷慨仁义、母亲萨拉的真正告白、家人之间的关爱又让她难以完全抛弃自由人文主义的观点。威廉森将安吉拉置于自由人文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对立空间,让两种意识形态互相冲突。斯温博士告诉他的学生,自己既不支持激进女权主义,也不赞同主流意识形态,而站在非本质主义、女权主义和多元文化主义立场。事实上,斯温博士曾先后以请客为名引诱安吉拉和梅丽莎,并对拒不接受后结构主义理论的斯蒂夫以挂课相威胁,在听取安吉拉的课程报告时引用莎士比亚的名言“女人啊,你的名字叫脆弱!”来发泄私愤。种种迹象表明,斯温博士言行相悖、表里不一,以教师的“权力”构建大学教育的“现实”。威廉森巧妙地设计了一个人物借以讽刺大学教育及后结构主义理论,他所指的“死白男”不是莎士比亚,而是后现代理论家。这一反讽式处理恰与观众对“死白男”的预期相背离,从而实现了其讽刺目的。

二、捍卫“白人神话”

威廉森在《死白男》中让莎士比亚复活并参与到澳大利亚现实生活中的处理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作为自由人文主义的维护者,莎士比亚早已成为西方文学经典的代表人物,他集中体现了英语世界的核心价值观。澳大利亚属于英国的“定居者殖民地”,本来是18世纪英国为了解决流放犯问题而在南太平洋地区开拓的殖民地,于1901年脱离了英国的统治,建立了澳大利亚联邦。澳大利亚对自己的“合法性”问题一直深为困惑,而且长久以来摆脱不了“文化自卑”(Cultural Cringe)的阴影,一方面急于摆脱对英国在政治经济上的依赖,另一方面又极力维持和英国在思想文化等方面的联系。基于上述原因,澳大利亚联邦成立后便开始实行“白澳政策”,从一开始坚持“盎格鲁-撒克逊”和“盎格鲁-凯尔特”血统,到后来逐渐接纳来自东欧

及南欧的“边缘性白人”移民^{[5]74},澳大利亚致力于保持其“纯白性”(whiteness)。“白人优越性”的意识形态在澳大利亚延续了几十年,20世纪60年代以后“白澳政策”才在国内改革者和全球解殖化和解放运动的双重压力下开始瓦解^{[5]75}。由于开始实行“多元文化”政策,大批“非白”移民来到澳大利亚,澳大利亚的土著居民问题也开始好转。然而,“白澳政策”与“白人优越性”的思想根深蒂固,《死白男》中安吉拉的祖父科尔·扎德就有这种思想痼疾,他“厌恶移民,厌恶土著,厌恶任何一个不像他那样是第五代澳大利亚人的家伙”^{[4]18}。虽然安吉拉说“澳大利亚的多元文化政策取得了巨大的成就”^{[4]18},但是,澳大利亚的民族思想意识主要还是“欧洲中心主义的”,是围绕白人文化传统而建立起来的^{[5]75}。

后结构主义理论对这种“欧洲中心主义”的“白人神话”及其传统价值观提出了强烈质疑,并对西方经典文学与政治意识形态之间的“共谋”关系进行了颠覆式揭露,“普遍真理”岌岌可危,这引起了西方自由人文主义者的焦虑和不安。威廉森对澳大利亚九十年代蓬勃发展的女权主义运动和多元文化主义等颇有微词,他坦言,创作《死白男》的其中一个目的就是为了讽刺“后结构主义,激进女权主义和多元文化主义等‘神圣’思想强加于社会的所谓政治正确性”^{[4]ix}。为达到这一目的,威廉森设计了斯温博士这一戏剧反角,让其以一个后结构主义者的身份质疑自由人文主义和澳大利亚中产阶级家庭的价值观。在与莎士比亚争夺澳大利亚年轻一代(安吉拉)的思想认同的过程中,斯温博士似乎胜券在握,因为安吉拉在听过他的文学理论课之后开始接受后结构主义思想并诘问西方文学经典中的价值观念。而这胜利又转瞬化为幻影,安吉拉在调查了她家里的“父权思想”和“女权主义”后,认为“现实”的确受“意识形态”的影响,但她同时也承认男女之间确实存在“生物性差异”,“人性”和“真理”并非“人文主义的虚构之物”。安吉拉在最后还是没有定论,但她明显倾向于自由人文主义思想。在《死白男》的最后,莎士比亚与斯温博士又进行了一场殊死搏斗,与开场不同的是,这次斯温博士没有击败莎士比亚,反而“开枪打伤了自己的脚”^{[4]397},根基不稳的斯温博士一瘸一拐地离开了舞台,威廉森藉此预示了后结构主义的失败。

威廉森对后结构主义的讽刺集中体现在对斯温博士的反讽式塑造上面。通过刻画一个后结构主义者互相矛盾的言行和最终失败的命运,威廉森巧妙地烘托了自由人文主义的优越之处。不仅如此,威廉森还以澳大利亚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为例来证明自由

人文主义深入人心的“永恒真理”。安吉拉的祖父科尔·扎德对自己的儿子严厉苛刻,吝惜钱财不让女儿上大学,却十五年如一日地将自己三分之一的薪水赠给受伤的工友,面对家人的指责他毫无怨言,而后告诉安吉拉如果自己受伤的话他的工友也会这么做。这种澳大利亚的“伙伴情谊”与自由人文主义相得益彰,威廉森塑造了一个有性别歧视和种族偏见,同时又具有深厚人文关怀的普通的“第五代澳大利亚人”的形象,捍卫了澳大利亚的“白人神话”。

三、扮演“文化斗士”

澳大利亚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迎来了新的理论热潮,后结构主义、多元文化主义等后现代理论与当时的女权主义运动交相辉映,澳大利亚的保守派与后现代理论派进行了一场空前的“文化论战”。90年代发生在澳大利亚一所大学的“性骚扰”事件(“奥蒙德案件”)将大学教育精英推上了风口浪尖,澳大利亚著名作家海伦·加纳因在其作品《第一块石头》(1995)中持保守意见而引发了“海伦·加纳之争”。海伦·加纳曾是一位积极的女权主义者,然而在这次事件中她却指责女权主义“过了头”,海伦·加纳的思想转变多少与威廉森有些类似。前文说过,威廉森早期的作品属于“新浪潮”戏剧,如《搬家公司》“对存在于澳大利亚的暴力行为做了深刻的揭露,同时也批判了人们长期存在的那种虚幻的安全感”^{[6]669}。如此一个具有“左翼”倾向敢于针砭时弊的剧作家,在创作《死白男》时却站在了保守的立场上,用冷峭的笔锋讽刺了后现代理论,扮演了“文化斗士”的角色,是什么原因使得威廉森转向保守主义的呢?

在谈到《死白男》的创作动机时,威廉森讲到自己曾经听一位“年轻的男性学者”给大家作关于解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讲座,在场的人包括威廉森都听得一头雾水,于是威廉森“下定决心要弄清楚后结构主义究竟是怎么回事”^{[4]vii}。为了讽刺后结构主义理论,威廉森在《死白男》中特意安排了斯温博士这个角色。虽然威廉森个人也承认“(后结构主义)理论并非全是胡说八道,像其它影响深远的理论一样,后结构主义如果没有一些真知灼见的话就不会如此盛行”^{[4]vii},但是,像海伦·加纳认为90年代女权主义“过了头”那样,威廉森认为后结构主义也“过了头”。《死白男》正是当时澳大利亚“文化论战”的应景之作,通过讽刺斯温博士的私人生活和理论立场,威廉森不仅讽刺了澳大利亚的学院派

教育,而且含蓄地否定了后结构主义理论。《死白男》里斯温博士是一位后结构主义者,与莎士比亚所代表的自由人文主义者誓不两立。斯温博士的理论影响了安吉拉看待问题的思路,但因其个人原因而最终没能赢得以安吉拉为代表的澳大利亚新生代的认可。威廉森在剧中将斯温博士的个人问题扩大化,藉此讽刺后结构主义及学院派教育,他以“文化斗士”的形象捍卫了自由人文主义思想。

威廉森声称《死白男》中加入莎士比亚这一角色使得该剧不局限于关注后结构主义和文学理论,其实该剧真正关注的是“二十世纪最后十年里男女之间的关系”^{[4]viii},这与他在其它场合的说法有些出入。在一次题为“戴维·威廉森论女权主义、后现代主义和麦当娜”的谈话中,威廉森告诉梅伊-布里特·阿克霍尔特(May-Brit Akerholt),他认为“是时候讽刺一下女权主义、多元文化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神圣’思想了”。凯思·温舒特尔(Keith Windschuttle)在一篇题为“文学的价值”的文章中称《死白男》“是对学术争论的直接干预”^{[4]xii}。威廉森坚持认为《死白男》只是一个讽刺剧,并非他“政治保守”的表现,但他却因为这部富有争议的剧作而成为一个“文化论战”的反角,后来威廉森承认这一名声主要归因于自己的剧作——《死白男》^[7]。

四、结语

戴维·威廉森的作品紧扣时代主题,语言生动幽默,内容贴近现实生活,受到澳大利亚观众的广泛认可。他早期的剧作塑造了澳大利亚年轻的城市中

产阶级形象,这些被称为“澳克”(Ocker)的人生活放纵,语言粗俗,无视习俗和现存的道德观念^{[6]674},这正是“新浪潮”戏剧的典型特征。威廉森后来放弃了这种创作风格,尽管他的作品因语言机智幽默、内容反映时代特征而仍受青睐,但是他的剧作逐渐丧失了“左翼”的锋芒而趋于保守。威廉森在《死白男》中使用反讽手段讽刺了后结构主义理论及其支持者,站在自由人文主义的立场捍卫了澳大利亚的“白人神话”。该剧在获得巨大成功的同时也因其保守观点而饱受争议,而威廉森也因此变成了“文化论战”的反角。曾有一位澳大利亚部长断言:今日的激进分子将会是明日的保守派,这正是对威廉森戏剧创作生涯的真实写照。

参考文献:

- [1] Brisbane Katharine. David Williamson: A Celebration [C]. Canberra: National Library of Australia, 2003.
- [2] Elizabeth Webby.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Australian Literature [A]. Cambridge: CUP, 2000.
- [3] 马金起. 论古典反讽与现代反讽——兼论现代反讽在中国当代小说中的存在方式 [J]. 山东社会科学, 2005(10).
- [4] David Williamson. Dead White Males [M]. Sydney: Currency Press, 1995.
- [5] Huggan, Graham. Australian Literature: Postcolonialism, Racism, Transnationalism [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 [6] 黄源深. 澳大利亚文学史 [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97.
- [7] David Williamson. Confession of A Culture War Villain [J/OL]. Australian Book Review No198: 18 - 19 [2002 - 01 - 20] <http://home.vicnet.net.au/~abr/FebMarch98/will.html>.

Defending Liberal Humanism?

—On David Williamson's *Dead White Males*

YANG Bao-lin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Suzhou University, Suzhou 215006, China)

Abstract: David Williamson is one of the most influential playwrights in contemporary Australia. His drama presents real aspects of Australian middle-class life and adopts humorous language, which contribute to its great popularity both at home and abroad. Williamson often resorts to irony in his drama to achieve effects of humor and satire. In *Dead White Males* Williamson adopts irony to mock at post-structuralism and defend "White Myth" in Australia. His conservatism makes the play controversial and he is thus considered as a villain in "the Culture Wars".

Key words: David Williamson; *Dead White Males*; liberal humanism; post-structuralism

(责任编辑:范艳芹)